

母校

作者：小河弯弯

“母亲的光辉，好比灿烂的旭日，永远地永远地照着我的心……”这是流行于上世纪30年代，一首名为《母亲》的歌的开头。是母亲含辛茹苦生我养我，给我以无私的爱，她永远是让我最动情的一个人。而母校，像母亲一样给我以革命的启蒙，授我以智慧的薪火，使我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对母校，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

1948年我在吉林联合高中读书时，主办过班级墙报，并写了一些文章。共产党派来的校长魏东明因此熟悉了我，并介绍我去东北大学深造，经过考试被录取了。当时，母亲在辽西农村，我暂住在一位中学同学家里，口粮奇缺，起居不便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能够有机会上大学，又是供给制，管吃管住，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幸运。当我在1948年9月，背着一套破行李来到东大报道时，真像范进中举那样兴奋。记得入学吃的第一顿饭是苞米碴子和雪里蕻炖豆腐，因为很久没能放开肚皮吃饭了，那天中午，偌大的食堂只剩下寥寥几个人，而我还在贪婪的吃呢！

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大学坐落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垅地区，路边的石头垛子门上，悬挂着醒目的校名大木匾，一进门是笔直的大道，两排白杨在路旁高高耸立，迎面是呈品字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三座大楼，巍峨壮观，如同三座古堡。据说这是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的。这是母校在我心目中留下的第一印象。在以后的漫漫人生路上，它成为矗立在我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。

名校和名师是联袂的。当时，全国尚未完全解放，东北解放区只有东大设有中文系，吸引文学界的诸多名流汇聚于此，真可以说群贤毕至、星光灿烂。在此无法把一长串闪光名字一一罗列，几十年过去，师长们留下的鲜活印象依然呼之欲出。著名散文家吴伯箫是文艺系主任、文学院长，大一时为我班讲授“读书指导”和写作。他一派儒雅的文人风度，从不说空话、大话，通过优美语言，把专业知识和人生哲理，如涓涓细流般送入学生心田。他用毛笔逐字逐句修改的作文手稿，成为学生的珍藏。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和电影《白毛女》歌词作者诗人公木，上大课讲授“中国革命问题”，论点明确，论述雄辩，讲到最后一句，下课

铃声同时响起，时间掌握得异常准确。鲁迅学生、作家锡金讲授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，回眸往昔，感慨万千，泪洒讲坛，记得班里女生也跟着落泪。三十年代、新诗开创者之一、诗人穆木天，头戴一顶瓜皮小帽，诙谐幽默，但他当年写的救亡诗却让人心情沉重，我记得其中一首是对话形式，大体是这样：“提问：你是哪国人？回答：我是中国人。啪的一记耳光！又问：你是哪国人？回答：我是满洲国人。啪的又一记耳光！再问：你是哪国人？哭着说：我不是人啦！”这首诗让我记忆至今。著名文史学者杨公骥，当时正对吉林西团山子新石器时代墓葬进行考古发掘，他带领我们现场实习，近距离接触了古人类墓葬遗存以及打磨精细的石器，使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在开学典礼文艺晚会上，演出了大型歌剧《血泪仇》，舞台上出现一位老人，拄一根拐杖，跌跌撞撞的边走边唱：“王仁厚，村前那个村后都走遍，走遍了前后村，没有人烟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荒旱，河南的老百姓快要死完……”表演逼真、感人，看得我心酸落泪。散会后，回到组里才知道，舞台上那位老人原来是同学张振义扮演的，舞台上的艺术魅力使我对身边这位同学十分仰慕。他是从佳木斯来的老同学，又是我们组长，政治上成熟。而我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，对革命道理一无所知，政治上十分幼稚，开会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有时还说错话，生活会上不时受到批评。可张振义却别具一格，他从不以势压人，谦虚低调、和蔼可亲、乐于助人。我在墙报上写过一首小诗，受到他郑重表扬。我去图书馆看书，把一双鞋晾在外面，适逢下雨，回来时那双鞋已摆在我床头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是组长替我拿进来的。这位在我心目中闪光的人，居然会想到替我拿一双臭鞋，真让人感动不已。后来党公开，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。

当时的大学，像部队一样，实行供给制，入学那年冬天，一人发一套拆洗过的灰黑色旧棉衣、狗皮帽子、生羊毛袜子、皮头布面大头鞋和两套单衣，这些行头，规定要穿三年。由于不洗澡、不换衬衣，生虱子司空见惯，有时候一伸手就捉住一个，虱子多了不咬人，谁也不在乎。经常的伙食是高粱米饭、白菜汤

或炖干萝卜条，隔一两周，会改善一次伙食，当天中午的菜谱不写内容，只写“另定”两字。此时，喜形于色的同学会奔走相告：“今天吃‘另定’啦！”、“今天吃‘另定’啦！”所說的“另定”，一般是大米干饭，一人一勺猪肉炖粉条。同桌一个叫刘述贤的女生，不吃肥肉，有好几回把肥肉块挑出来给我，此事让我至今未忘，见到她还道谢呢！我班住的西山宿舍是建在山坡上的红砖平房，没有上下水道和暖气，需要大家轮流值日，负责领煤柴、生火炉、打饭、打水、倒尿桶。——当时的生活虽然极其简朴、衣食粗砺，但足以温饱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，真是如同进入了天堂。集体生活中的思想工作、组织纪律以及作息时间都很严格，起床、早操、读报、自习、吃饭、听大课、讨论等等，都要听从统一号令。尤其是集中政治学习，如“土地改革”、“批判肖军思想”等，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，更加紧张、严肃，听报告、大小会讨论、自我检查、联系实际、人人过关，本人就曾经被扣上“小资产阶级立场”、“政治不开展”、“思想有问题”等帽子，压力大得让人喘不上气来，不过，确也增长了认知和阅历。这种学习结束，正常上课时，就宽松多了。到了大二、大三时，课程紧张、忙于读书，可再忙也还是精力过剩、激情燃烧，熄灯后躺在被窝里，就会打破许多禁忌，一组十多个人，七嘴八舌地交换各种摆不上台面的信息，比如，议论哪个女生漂亮、谁最温柔；逼结婚的同学讲新婚第一夜……直到组长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大声咳嗽，这才罢休。

那时校园很大，任凭山花、野草、杂树自由生长。离宿舍较远处有一片开阔草场，一人高的青蒿如一道围墙挡住人们视线，草丛后是一片池塘，塘边的滩涂上，长满荠菜、紫花地丁、蒲公英、狗尾巴草，如同一块用花草编织的地毯，静悄悄的，很少有人光顾，我得空会溜到那里去，仰卧在草地上，望着兰兰的天，静听池塘里的蛙鸣，展开无边无际的遐想，吟哦着涌上心头的诗章，那里，成为我放松心情的一方家园。

上大学期间，经历了解放战争决战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、以及抗美援朝三大历史事件，学校由吉林迁到长春，校名由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。此间，



作者简介：小河弯弯，原名谢仲清，在辽宁从事新闻工作多年，作品不少，可惜都已成为明日黄花。近年，不时写些纪实散文、诗歌，为的是不让自己太快忘记，把经历告诉给爱听的人，并使生活距离文学更近一些。现居北京。

我们学习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，投身于相关的社会实践（如为志愿军伤员抬担架、输血、制作炒面、下基层宣传等等），也大体修完中文系的课程。在激情燃烧的革命熔炉里，经历了无数次水洗火炼般的锤炼，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，成长为一个初步具备科学世界观、革命人生观和较高文化知识、办事能力的时代青年；入了团、入了党，逐步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和新闻单位的领导人。这一切，都源于母校的培养和造就。

半个世纪之后，2003年秋，同班学子23人，为纪念毕业50周年，怀着朝圣心情回访母校吉林八百垅东北大学旧址。虽然学校早已搬迁，但她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圣地，如同当年的延安。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，我们驱车来到八百垅，三座花岗岩石楼被周边现代化楼群包围着，已经显不出她的雄伟，但依然那么亲切。我久久抚摸着冰冷的石墙，仿佛其中还蕴藏着我的体温和躁动的青春。登上楼顶平台，那是当年经常开会的地点，我恍惚看到一群穿着旧制服的年轻人身影，听到吴伯箫院长的声音在交响回荡。雨水打湿我的脸，合着热泪，沿着脸颊流淌。

啊，我永远的母校！